

吴易风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多次就苏联经济学范式论述了经济学和哲学问题。（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引仅注页码）这些批注和谈话，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探索，是对经济哲学的重要探索，为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留下了十分珍贵而又非常丰富的理论遗产。在这些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关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述，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1.苏联经济学范式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现在否定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毛泽东当年对苏联经济学范式采取分析的方法，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是苏联经济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本文所说的苏联经济学范式，不是指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而是特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下简称“苏联教科书”)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

苏联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已经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全面的回答。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第634页）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总体评价是：“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第799页）

对苏联教科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毛泽东表示赞赏。例如，在苏联教科书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毛泽东说：“好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第423页）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特别是对迎合帝国主义口味的地方，毛泽东则表示坚决反对。例如，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骗。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第96页）

苏联教科书之所以存在严重缺点和原则错误，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成熟。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第152—153页）主观原因是，苏联教科书作者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第422—423页）

毛泽东对苏联的辩证法作了历史考察。他指出，“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第742—743页）他还说：“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半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第744页）说到赫鲁晓夫，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第743页）苏联教科书不少地方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2.经济学家要分析两重性，要应用矛盾分析法毛泽东指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第576页）毛泽东以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为例，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植物和动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的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第576—577页）毛泽东关于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两重性的论述，对我们认识事物，特别是当前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改革开放，社会就会停顿，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不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相对稳定形态，社会主义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的根本性问题。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分析法是研究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可是，苏联教科书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入手。毛泽东指出：“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第800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

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同上）苏联教科书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第273页）

3.经济学要研究客观经济规律，但不能用规律自身来说明自身毛泽东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第801页）他举例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证明是正确的。”（第801—802页）

毛泽东在评议苏联教科书这一缺点时说：“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第634页）他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第713页）

毛泽东这样总结了认识规律的过程：“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行研究，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第347页）

客观规律不能违反。毛泽东批评当时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刮起的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时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加‘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第39页）

4.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苏联教科书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此不同，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

苏联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与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批评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第340页）毛泽东将斯大林的说法同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作了比较。斯大林说：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不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毛泽东说：“斯大林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第346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是否有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有可能转化，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他说：“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第122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需要不断加以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段时间就不适合了。毛泽东这样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第341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同上）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就应当始终抓住基本矛盾，从基本矛盾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部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主张：“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第422页）

5.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和不平衡毛泽东主张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和不平衡，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关于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对此，毛泽东评论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第415页）

毛泽东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第416页）

毛泽东这样阐述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同上）

苏联教科书在个别场合不得不提到苏联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落后造成局部比例失调现象。毛泽东指出：“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第679页）在总结这方面经验并谈到我国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第180—181页）

针对苏联教科书不讲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不讲按比例和不按比例的比例，毛泽东指出：“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济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第383页）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平衡。”（第421页）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第383页）

6.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量变和质变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第256页）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第332页）

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第257页）

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量变和质变，而且预言共产主义阶段也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历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第258页）

与量变和质变问题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所有事物皆有“边”的思想。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第259页）毛泽东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他划分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第259-260页）

7.经济学家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分析了当时苏联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实质，说：“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第462页）

苏联教科书深受赫鲁晓夫的影响，反复地突出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第403页）毛泽东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第428页）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参见第431页）“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第431—432页）

毛泽东还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第576页）

8.经济学家要有哲学家的头脑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哲学思维是经济学家写出好的经济学论著的必要条件。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

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第803页）毛泽东认为：“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第713页）至于像苏联教科书，毛泽东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同上）

毛泽东研究了苏联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了苏联不同社会阶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事情总要从两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就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第743页）

毛泽东相信，“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同上）他说：“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不可避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第743—744页）

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这个结论是这本教科书缺乏一贯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对于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毛泽东的评语是：“完全不对”。（第235页）

当时，毛泽东是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理论上指出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现在，则是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证明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对。历史和事实证明，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最终成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内在原因。导致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外部原因正是通过这一内在原因而起作用的。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济哲学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毛泽东经济哲学体系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毛泽东的经济哲学和从经济哲学视角对苏联经济学范式的评论，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慧珍（《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